



西楚考论

程芳银

西楚,作为楚的一个区域,起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总体来说,一般都认为起于战国或者秦汉。福建华侨大学文学院徐华教授说:“‘西楚’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主要出现在秦汉时期。”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健教授也说:“在楚国势力东渐的漫长过程中,楚文化也风靡于淮泗一带,与当地本土文化相互激荡,至战国末年已成为江淮和淮北地区的文化主流。……历史上留下的所谓三楚域分,即东楚、西楚和南楚,作为地域概念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准确地讲,应是产生于秦汉之际。”其根据正如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韩国河先生在《西楚文化的内涵特征》一文中所云:“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记载有关‘西楚’、‘三楚’的文献便是《史记》了,先秦文献从未出现过‘西楚’一词。退一步讲,即使战国时有所谓三楚之分,矛盾仍然明显。”

究其原因,简单地说,他们都认为:楚的发祥地是“荆”,是在今湖北一带,荆楚、荆州就是其地。实际上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楚,历史悠久,李白说:“远接商周祚最长”,其区域是辽阔广大的,其文化更是复杂、丰富、多样的,《淮南子兵略训》云:“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郟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





这是汉代人眼中的楚,不过已是战国时的楚了。姜亮夫先生曾论述过楚之地理大势:“其境北接汝颍,南接衡湘,西连巴,东连吴。方城带其内,长江梗其中,汉水、淮水、沅、湘之属,迄其上下。汉东江南之境,小国鳞次,介于其间,楚皆灭之。其疆域,北界秦、韩、郑、宋、薛、郟、莒等,东界越,南界越及百越群蛮,西界秦、蛮、巴等。……其地跨今十一省之多,为战国最大之国。”这是战国之楚,并非古楚。说“楚本古荆州之地,”这个楚也只能指战国。

形成于公元前 17 世纪—11 世纪的甲骨文里,只有“楚”,《殷契粹编》73、842、1315、1547 等契中都有“楚”字;可是甲骨文中没有“荆”字,直到商末周初时才有“荆”字。成王即政之后的《令簋》、《贞簋》里有“伐楚”的记载。《贞簋》曰:“贞,从王伐荆。”周昭王时(约前 989 年—977 年)的《过伯簋》云:“过伯从王伐反荆。”照此看来,“楚”在前。“荆”在后,“楚”比“荆”早。那么,荆不是最早的古楚,已经十分明确。古楚最早是在东部,东夷文化是其源。

萧兵先生在《楚辞文化》一书中说,楚文化“它们的脐带都是多头的,其中强韧粗壮的一支却系在中国东部的文化胎盘上”。他还进一步更明确地说:“所谓‘东部’或‘东方’文化,在先秦学术文化史上,应指上古东夷人集群文化及其直系后裔‘齐鲁文化’。东夷文化源远流长,内涵深广,它是东海—西太平洋文化最古老、最强大的一支……殷商文化则是它最繁荣、最先进、最直接的一支。”

郭沫若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书里反复强调:“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是“殷之同盟国”,“亦即《逸周书·作雒篇》之熊盈族”;关于这一点,他在《金文所无考》里讲的最清楚:“楚之先实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逸





周书·作雒篇》……熊盈当即鬻熊，鬻熊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江汉水而东下者相冲突。《左氏传》(僖公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者，是也。”郭沫若先生在《历史人物》中还指出：“中国的真实文化起于殷商，殷商灭亡之后分为两大支：一支在殷人手下向北发展，一支在徐楚人手下向南发展……徐人的文明并不比周人初起的文明落后。徐是与夏商周并存的古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文化十分先进。吴越人的汉化一定受到徐楚人的影响，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宗人是传播殷文化向中国南部发展的。”因此，我们说古徐国是与夏商周相始终的甚至有时国力比中央政权还要强的一个古方国，其疆域和国都也在被正统政权长期称为“东夷”、“淮夷”、“徐国”、“舒地”、“海岱及淮”的东方地区，即现在的北抵临沂、济宁，西达河南、安徽东部，南至长江及苏北地区的广袤的范围内不断迁移的古方国。古徐楚文化是既受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影响和制约，反过来又对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沂淮文化的源头和发源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名学者童书业先生也说：“楚族盖本起东方，‘熊盈’之‘熊’即楚氏，是楚王室盖即周人所俘熊盈九邑之一自东迁西者。”他与郭沫若先生一样认为，熊盈本淮夷，淮字从水从隹，卜辞之“隹夷”即“淮夷”。他指出盈、嬴可通，“熊盈”指“嬴姓熊氏”。他说：“淮夷之大者曰‘熊盈族’……徐、奄、熊、盈等皆为淮夷之族。所谓‘熊盈’者，盖指盈姓熊氏之族，‘盈’当即‘嬴’，徐、奄、秦、赵、邾皆嬴姓。楚国王室则以熊为氏，是此类国皆‘熊盈’之族也。”郭、童二位先生说的极是，宿迁周围大地上的徐、奄、邾、钟吾等是少昊之墟，嬴姓。





丁迪豪先生说：“楚国是东夷，殷也是东夷，楚国是殷民族的支裔。楚国原来的地方，大抵在殷的附近，就是后来《诗经》和《左传》里所说的‘楚宫’和‘楚丘’。殷人为周人所败，楚为周民族所压迫，遂向南方移动，退保荆山而为国，与周人隔绝，所以楚国在文化方面是犹有殷之遗风。”

顾铁符先生在《楚国民族述略》中根据楚人所托的祖先“颛顼”（屈原《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就是颛顼），推出楚人来自东方。他根据《帝王世纪》、《史记·五帝本纪》指出：“太昊都陈，少昊都曲阜，颛顼都穷桑，后徙商丘，帝喾都亳，他们建都的地方都在中国偏东的地方。”萧兵先生解释“颛顼属东夷”，其具体的地点“主要是在河南省的东半部，以及山东省的西南隅，个别在江苏省的西北角”。

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他说：“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

清代学者徐时栋所著《徐偃王志》卷首称：“徐得国传二千年，几与夏商周相始终。”翦伯赞先生曾经也说过：“据青铜器铭文记载，自周初以至宣王（西周倒数第二个君王）之时，周王朝和东夷、淮夷诸部落间，不断地发生战争。淮夷中最大的是徐方。周穆王时，徐偃王曾起兵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铜器铭文中也有穆王时周与淮夷作战的记载。厉王时周人与南方又有许多战争。”就连著述《楚文化的东渐》一书的作者刘和惠也承认楚文化东渐以前在江淮淮海地区。“这一地区商周时期文化遗址发掘和试掘的有：铜山丘湾、





高皇庙,连云港九龙口,邳县黄楼,新沂三里墩,泗阳宗墩,萧县花家寺等。这些遗址商文化层多压在龙山文化层之上,陶器以灰陶为主,多绳纹,主要器类有鬲、簋、甗、盆豆等,其特点与中原商文化比较接近。”实际上在他所认定楚文化东渐之前,出土的器皿已经是“楚”的形式了,所以他只敷衍言之是与中原商文化比较接近,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楚文化东渐之前,会有楚的器皿。1954年在鲁南泰安西南发现青铜缶6件,刘和惠承认:“铜缶有盖,直口,短颈,双兽耳,耳上套有提链,盖顶有圈形把手,肩腹间有圆形饼饰,器身似饰蟠虺纹。这种形制与浙川下寺3、10、11号楚墓所出的‘浴缶’,寿县蔡昭侯墓所出土的‘盥缶’基本相同,完全是楚器的风格。”“按此缶形制,应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之物,但是该器口沿上刻有‘楚高’、‘右征君’数字铭文,与寿县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铜器铭文风格完全相同,由此看来,器具是旧铸的,铭文则是后来刻划的。”他无法解释铭文为什么会在楚东渐之前就有“楚高”的文字,所以,他只好说,“器是旧铸的,铭文则是后来刻划的”。

众多的史料证明楚之源在东夷,时代很古老。司马迁的时代没有见到甲骨文,地下挖掘的文物也较少,司马迁就是根据当时文献和所见所闻而撰《史记》,所以有时司马迁对人物的籍贯,也是含混言之,如老子是楚人、伍子胥是楚人等。同时《史记》姑且不论千年以来的佚亡伪窜,就是一把秦火也已把楚之史料灭亡殆尽,所以秦留下来的史籍对楚都是贬低的,如自相矛盾是楚人,刻舟求剑是楚人,南辕北辙是楚人,雍表夜涉是楚人,引婴投江还是楚人……楚人是愚蠢的,是机械的,是不知时变的。

因而三楚之分,史料很少提及。历史上留下的三楚之分,随时





代不同,而各有所异。因而争论不休。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胸、缙以北,俗则齐。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据此,则西楚是由沛、陈、汝南、南郡四个区域构成。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解释徐、僮、取虑云:“取音秋,虑音闾。徐即徐城,故徐国也。僮、取虑二县并在下邳。”

这说明宿迁境内的徐(包含泗洪、泗阳、宿豫、宿城等地)、僮(沭阳等地)及取虑等皆在西楚境内。

东楚,则在海州(今连云港)、广陵(今扬州)和吴(今苏州)一带。张守节《正义》解释道:“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扬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其俗类徐、僮。”

南楚,衡山郡(今鄂东豫南),九江郡(今寿县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豫章(今江西)、长沙郡(今湖南)在今两湖、江西一带。

三国时期的孟康说:“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司马迁恰恰没有说到江陵(古荆州)在南楚的范围内。一则这





是太史公司马迁按汉时的郡治而言,二则江陵(荆州)远没有古之西楚久远。故认为三楚之分,不是一个时期划分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因为古人崇拜数字三,所以,一个区域多分为三,如秦有三秦、晋有三晋、齐有三齐、吴有三吴、苗有三苗、湘有三湘……从古楚来分析,今之西楚,比湖北的荆楚要早得多。

因其在东夷文化的西侧,东有吴越,故有西楚之名。史料出现的“西楚”之名,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1958年冬,在江苏邳县刘林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出土文物甚多,其中出土两件簠,簠上有铭文“西替乍其妹斲钻(簠)”。著名的考古专家尹焕章辨认西替为西楚。从出土的铜的器形和铭文来看,是标准典型的楚器。春秋战国的墓葬铜簠上有铭文“西楚”,说明叫“西楚”之名的时代应该在此之前。西汉扬雄在《方言》中三次提到西楚方言区,“楚东海”之间,“青徐淮楚之间”的区划。形成一个方言区,不是一个短时期,应该是时间久远。

综上所述,众多的史料证明楚之源在东夷,时代很古老,建都很早,建都具体的地方就是河南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西南部,安徽东北部。正是西楚的范围区域。亦即今天的徐州、宿迁、商丘等为中心的大淮海经济区。

(本稿由宿迁市社科联推荐)



程芳银,江苏宿迁人。宿迁学院中文系教授,中文特级教师。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多家学会会员。已出版《清诗撷英》、《中国小说发展史新论》、《中国都市民俗学》、《易海指航》、《宿迁史话》等专著 10 多部,发表论文 100 多篇。近年来主持了“现代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中国都市民俗”、“创业文化研究”、“骆马湖文化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题。

